

韩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使2020年的田野考古深受影响，导致很多发掘项目滞后或缩减。尽管这一年的重新开启甚晚，考古人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取得可喜的考古成果。隋唐时期，帝国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各族人民互相交往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开创了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手铲释盛世华章，妙笔书多元一体，是2020年隋唐考古的主旋律。在“文化润疆”下的边疆考古为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提供实证依据，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

## 文化润疆，边疆考古成果注目

### 唐朝墩古城遗址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西距北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之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探明唐朝墩古城遗址的整体面貌，摸清城址的规模、形制、年代序列和文化内涵，响应丝绸之路沿线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号召，自2018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三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基本确认了唐朝墩古城遗址性质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公元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废弃。

2020年发掘古城中心的高台遗址，发掘面积600m<sup>2</sup>。遗址整体形制布局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的特征。遗址由内外墙组成，墙体由土坯垒砌，北外墙残长约28米，南外墙残长约25米，南、北外墙相距约12.3米，外墙于遗址西侧绕弧线形相接，东侧北外墙向南、南外墙向北分别转折出2-3米的墙角，形成东门门道。外墙内侧发现有青砖面及柱础。内墙靠近高台中部，与外墙平行，目前仅发现南内墙和北内墙。北内墙两侧壁面发现连续的壁画遗迹。综合遗址的整体面貌及遗迹现象，经初步判断，唐朝墩古城高台遗址可能为一处高昌回鹘时期前殿后塔回廊式佛寺遗址。

。

另外还清理出灰坑14个、房址1处、墓葬7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动物骨骼等。此外，工作队还对南城墙进行了勘探调查，考察了吐虎玛克城址等周边遗址。考古工作揭开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古城建制证明了中央对边疆管辖的悠久历史，中心高台遗址的新收获体现出佛教对新疆北部产生的深刻影响。

##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州尉犁县境内，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烽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组成，呈西北-东南向沿孔雀河北岸分布。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遗址位于红柳沙堆上，沙堆呈椭圆形，上小下大，底边东西长约60米，南北最宽35米，原始高9.8米。修筑烽燧时，对沙堆顶部和周边有意识地进行过处理。

烽燧平面方形，底边长9.4、残高约5.6米。烽燧由土坯垒砌，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有胡杨木。烽燧南侧护坡由土坯垒筑。烽燧以西有房址，三开间，墙体局部残存草拌泥皮和白灰墙面，房址内发现有凉炕、灶、柱洞等遗迹。

以烽燧为中心，在沙堆四周发现5处灰堆遗迹，其中1、2、3、4号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5号灰堆为烽燧风蚀坍塌后形成的堆积。出土各类遗物1230余件（组），质地有陶、铜、铁、木、漆、纸、皮、草、纺织品等，其中包含有珍贵的纸文书、木牍786件。

出土的这批木牍、纸文书，主要见于1-4号灰堆中。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尚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多数军事机构和防御线路均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文书内容显示各级军事机构运行正常，并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并对该地实施着有效戍守管理。出土文书显示烽燧遗址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事设施，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成果显著。铜器金相分析有青铜、黄铜两种。开展动植物考古，灰堆中的大量动植物标本，发现34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包括粮食作物六种：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园艺作物九种：桃、杏、枣、核桃、沙枣、西梅、亚麻、葱、葫芦等。动物标本初步鉴定有马鹿、野猪、黄羊、马、牛、羊、驴、骆驼、天鹅、白鹭、鱼等，其中以野生动物为主。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发掘，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对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补缺军事文献遗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 北庭故城考古

2020年北庭故城的考古工作分别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内城北门外侧和内城北门南侧三个地点展开。

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发现一个回鹘时期依托城门增建的建筑遗迹，平面长方形，用夯土和土坯建造而成，出土有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发掘了西门的护城壕遗迹，护城壕距城墙约20米。不同位置的护城壕宽度不同，城门门洞附近的护城壕上口宽度为9-10米，深度为2.9米。城门以外的护城壕加宽，上口宽度约20-30米。护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联珠纹莲花瓦当。

内城北门外侧发现有护城壕，出土莲花纹瓦当。在内城北门南侧发现铺砖地面，由素面砖、莲花纹砖混铺而成。莲花纹方砖，四角为唐草纹，中间的花心以莲瓣为主题纹样，外侧一圈联珠纹。

继续发掘外城南门内侧附近的6号建筑基址，为一座高台式佛殿基址，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整个佛殿基址外围发现部分围廊遗迹。

内城北门南侧的8号建筑居址，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包括辽和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的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

10月24日，北庭故城考古4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北庭故城考古以实物证明唐代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四个共同”的重要实物教材，对于贯彻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伏俟城考古调查

文献记载吐谷浑“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伏俟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卡加村。伏俟城东连西平（今青

海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南下可达益州(今四川成都),西通鄯善(今新疆若羌),是古代连接东西交通的重镇。“伏俟”为鲜卑语,汉意“王者之城”。2019年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2019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伏俟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是吐谷浑王城多年未有的突破性新发现。

厘清了内城的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1座,居住址1处。

城址分内外两城,外城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1442-1600米,南北1960-2200米,总面积3.29平方公里。外城东面有南北向平行并列的两道墙体,间距363-454米,墙上发现有门址。墙宽3-4米,墙外有宽3米的壕沟。外城东墙中部内侧发现夯土台1座,其上绳纹瓦片堆积丰富。外城内发现数处房址和灰坑。外城以外区域发现11处遗迹,包括城址4座,夯土台5座,居址区1处,人工堆筑高台1座。

东部南城四面墙体地面略有存留,边长110-138米,东墙中部开一门,门宽13米;城内中部有一夯土台,夯土台上及周围发现大量绳纹瓦片,城外壕沟宽7-8米,深2-2.5米。东部北城边长207-254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基本完好,东、西墙各开一门,东门宽11.5、西门宽10米,墙内两侧有曲尺形夯土建筑,探孔内发现大量木炭、烧土及动物骨骼残骸。东墙中部也有一门,门宽11.5米。城内中部偏西有一长40、宽18米的夯台,现存高度2.6米,断面夯层清晰。城墙外壕沟宽18米,深2.6米,壕沟内有多层淤土,包含木炭、动物骨骼及折线纹陶片。

东北小城边长52-54米,城内中心有一边长10-14米的夯台;东墙中部开一门,门宽4米。西北部小城边长70米,城内有一边长5-6米的夯土建筑,地面采集到大量陶片和宽扁形器耳残块,陶片纹饰有绳纹、折线纹、水波纹等。

采集的木炭和动物骨骼标本经测年为426-657年,属北朝至隋唐时期,可知伏俟城外遗迹点属于吐谷浑伏俟城周围的附属建筑。

内城位于外城南部,规模较小而城墙高大,东向开一门。在内城西北角发现大量瓦片,分板瓦和筒瓦两种。瓦大多有纹饰,板瓦外面纹饰有绳纹、折线(叶脉)纹、四叶纹、麻点纹等,瓦内面多饰麻点纹;筒瓦外多饰绳纹和折线纹,内面饰麻点纹。个别板瓦、筒瓦外面有模印或刻写的“天”字,可能是“天王”二字的合体。首次发现和辨认出来北朝隋唐时期的吐谷浑遗物。在内城东门内采集的木炭标本测年为公元973-1049年,可知北宋对伏俟城进行了重新利用和改建。

伏俟城结构完整、形制独特,内涵丰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吐谷浑的国家形态、都

城建制、物质文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也为认识北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形态提供了一个范例。

## 云南大理五指山遗址南诏时期官家寺庙建筑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对五指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五指山遗址位于大理市太和街道阳南村西，北距太和城仅600米。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汉晋、南诏、元明等不同时期遗存，主体遗存为南诏时期，发现建筑基址14座、夯土台基2处、礅墩155座、石墙63道、踏道3道、沟23道、砖瓦窑2座，出土瓦片40多吨，瓦当、滴水、鸱吻、有字瓦、陶器、釉陶器等8100多件，支钉、垫片9200多件。

五指山遗址发现南诏早期的塔基、高低错台及移柱造的建筑，同时还发现佛像、经幢、善业泥印模、塔模、香炉及字瓦等佛教遗物。从建筑结构及出土遗物来看，五指山遗址是南诏都城太和城的重要寺庙功能区。一号建筑基址，东西长41.5、南北宽20.6米，由大殿、南北廊道、天井、门廊、南北阙台、院内平台、大门等部分组成独立院落。大殿为长方形，面阔三间9.9米、进深三间11.6米，地面铺绿釉方砖。大殿分为高低错落的两台，高差1.3米，为形制独特的内外堂式建筑。大殿东侧以碎瓦叠砌为月台，西侧有排水沟环绕。大殿东向洱海，正对洱海东侧独立山体（红山）。

二号建筑基址为塔基，由内外两道方形石墙组成，总体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内层石墙以石块及红粘土垒砌，围合为方形塔身，塔身南北长4.6、东西宽4.1米。外层石墙为基座，基座南北长8.6、东西宽8.8米。

三号建筑基址座西向东，东西长33.5米、南北宽28米，由大殿、朵殿、南北廊道、天井、门廊等部分组成独立院落。大殿居中，平面略呈“凸”字形，面阔12、进深11.7米。大殿正中有台阶，殿内礅墩排列不规则，地面斜铺方形青砖。大殿南北两侧有方形朵殿，朵殿边长4.8米，北朵殿正铺绿釉方砖。三号建筑基址下叠压有两座南诏早期砖瓦窑，窑室平面为梯形，较宽的一端留有烟道。釉陶经幢为空心八面体，直径15厘米，表面施黄釉，幢顶有“唵阿羅般石（若）那□尼”大字，幢身写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及含有“嗟耶”字样的经文。出土釉陶香薰盖为八瓣莲花形，有排烟孔，表面及内壁均可有梵文。遗址东部是南诏时期生产砖瓦建材及釉陶器的窑场。



2020年航拍全景

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由茆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

地下部分由墓圻、墓道、殉马坑、照墙、殉牲坑、甬道、墓门、墓室组成。2020年对地下部分进行全面发掘，发掘表明墓圻与封土不完全重合，墓圻西壁和南壁各有一施工通道，四壁有内收的二、三、四层生土台，在墓室上部平铺有厚0.4-1米的砾石防盗层，墓圻东南部发现一平面呈长方形的殉牲坑，殉牲坑顶部铺有成排棚木，棚木下有横梁和立柱，四壁由土坯块垒砌而成，东端有台阶状通道和木门，底部发现大量被肢解的动物骨骼，主要以牛、羊、鹿为主，还发现马骡、骆驼等。墓圻填土还发现有殉人和卜骨。



墓室全景



主墓室木构件



金器及装饰品



印章

### 黑龙江渤海遗迹专题调查

按照2020年度工作计划，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牡丹江市辖区、海林市以及林口县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工作。此次考古工作共调查了87处遗迹，牡丹江市辖区41处，海林市25处，林口县21处。有城址、聚落址、墓葬、岩画和长城遗迹五类。遗迹包括城址11座，其中平原城6座、山城5座；



聚落址67处，多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墓葬7处，多处墓葬保存状况一般；岩画1处，为群力岩画，岩画绘制在峭壁中的一块岩石壁面上，其上有一块伸出的石板遮挡风雨，岩画距江面约30米；长城遗迹1处，为牡丹江边墙之牡丹江市辖区段，牡丹江边墙为顺山势就地取材修筑，墙体分为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四种类型。

## 辽宁城子山山城遗址

城子山山城位于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城子沟内，坐东向西，平面呈“∞”形，由石筑城、土筑城两部分组成，城墙总长7197.9米。本年度按计划发掘了城子山山城1、2号门址。1号门址为山城东门；2号门址山城南门。发掘面积500平方米。1号门址清理出完整的门道、两侧墩台和墙体、门内侧护坡、门内东侧马道等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高句丽时期板瓦、筒瓦和瓦当残块、铜器、铁器等。2号门址，仅清理出门道西侧墙体和门外护坡局部，出土大量高句丽时期建筑构件。经过发掘搞清了门道的结构和两侧墙体的垒砌工艺，为南墙墙体和门道的维修、修缮工程提供了考古依据。

## 丝路研究

文化交流，总是渗透在诸多细节之处，通过对一些细小的文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2016年开始，以“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为副标题的东西文化交流著作《丝路豹斑》出版，从一些显而易见但是少有人关注的细节来研究诸多文化交流的痕迹。2020年《丝路豹斑（续集）》重磅推出，该书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将诸多文化交流现象串联在一起，论述了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中亚、西亚及古印度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

与该书风格相同的还有《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围绕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考察新近出土的丝路文物，解读人类瑰宝的视觉心态与图像模式，复活外来文化的细节。《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从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

## 政策引导，石窟寺考古顺势而为

### 宗教考古专委会成立

2020年11月27日，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在重庆市大足区举行成立大会。宗教考古是以有关宗教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属于历史考古学领域。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宗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社会科学。成立中国考古

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以期整合全国各地以佛教考古为主的宗教考古研究力量，充分发挥考古学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实物资料的优势，为从事历史考古和历史时期宗教考古及相关领域的学者搭建学术合作平台，以推动和促进宗教考古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在国家文物局统筹与协调下，以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为核心学术组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为重要学术指导单位，与各地石窟寺的管理和研究单位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和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养与轮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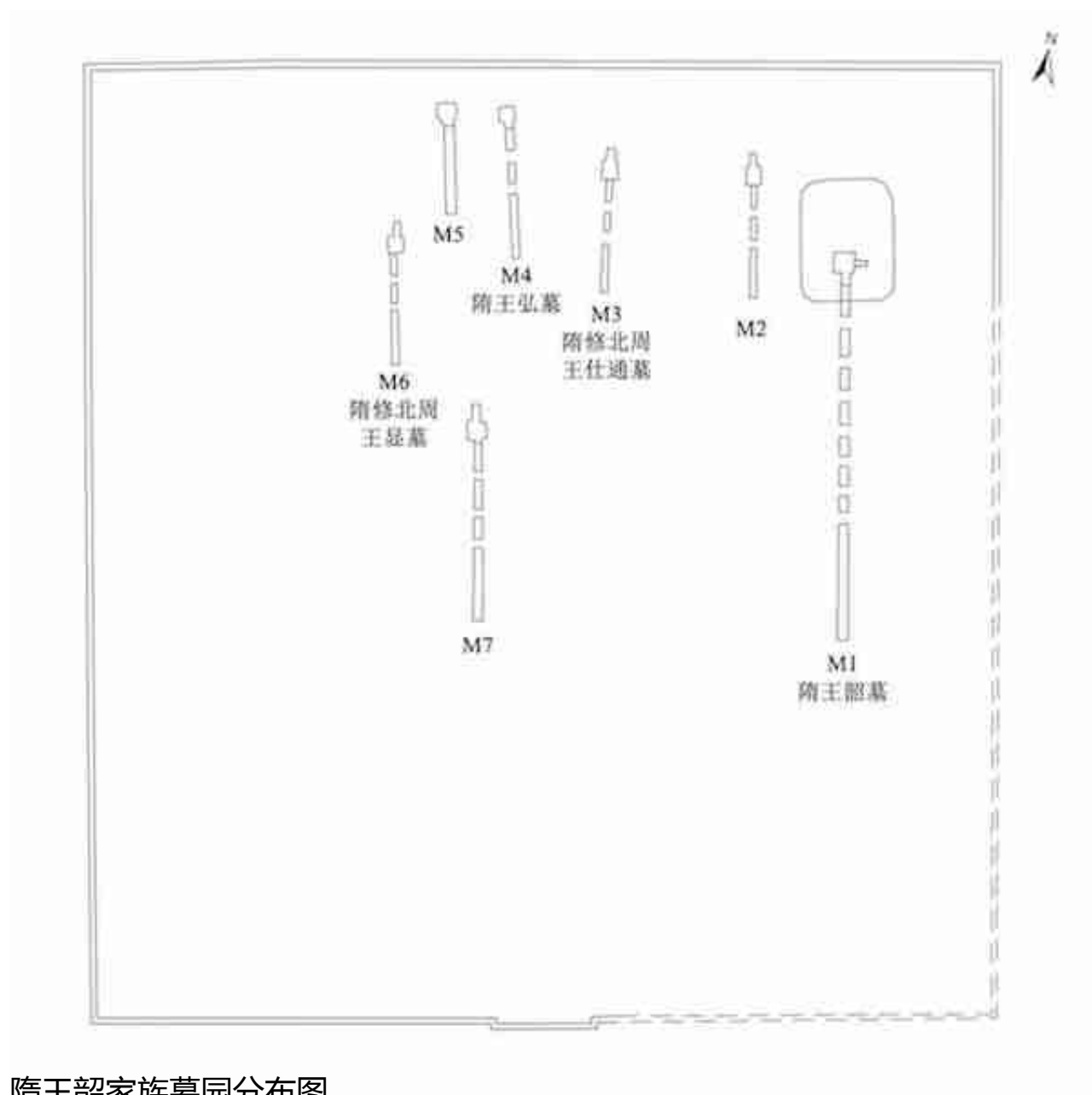
### 云冈学与敦煌学并蒂莲生

2020年6月24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山西省太原召开，这标志着云冈学从1984年提出，终于迈出关键一步。专家学者从云冈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的内容和对象、理论方法云、课题规划与经费等方面建言献策。云冈石窟石窟院多年来依托大同云冈石窟，深挖云冈文化内涵，在文物、宗教、考古及维修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云冈学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敦煌学”，是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正式提出，是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文献而渐次形成。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含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哲学、宗教、考古、语言、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云冈学以云冈石窟为核心建立学术体系，研究内容要包括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历史、文化交流、遗产保护、大同地区的区域历史、地理、水文等方面，以及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等。把云冈学建设成为开放的学科，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建设经验，建立云冈学的学理体系，开创自身的理论与方法。

### 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周年纪念活动

去年是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周年。2020年10月19日的“龙门石窟保护研究成果发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召开，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发布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年取得的六大重要考古新成果。作为龙门石窟申遗成功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也在洛阳博物馆对外展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三大石窟首次举办的大型艺术联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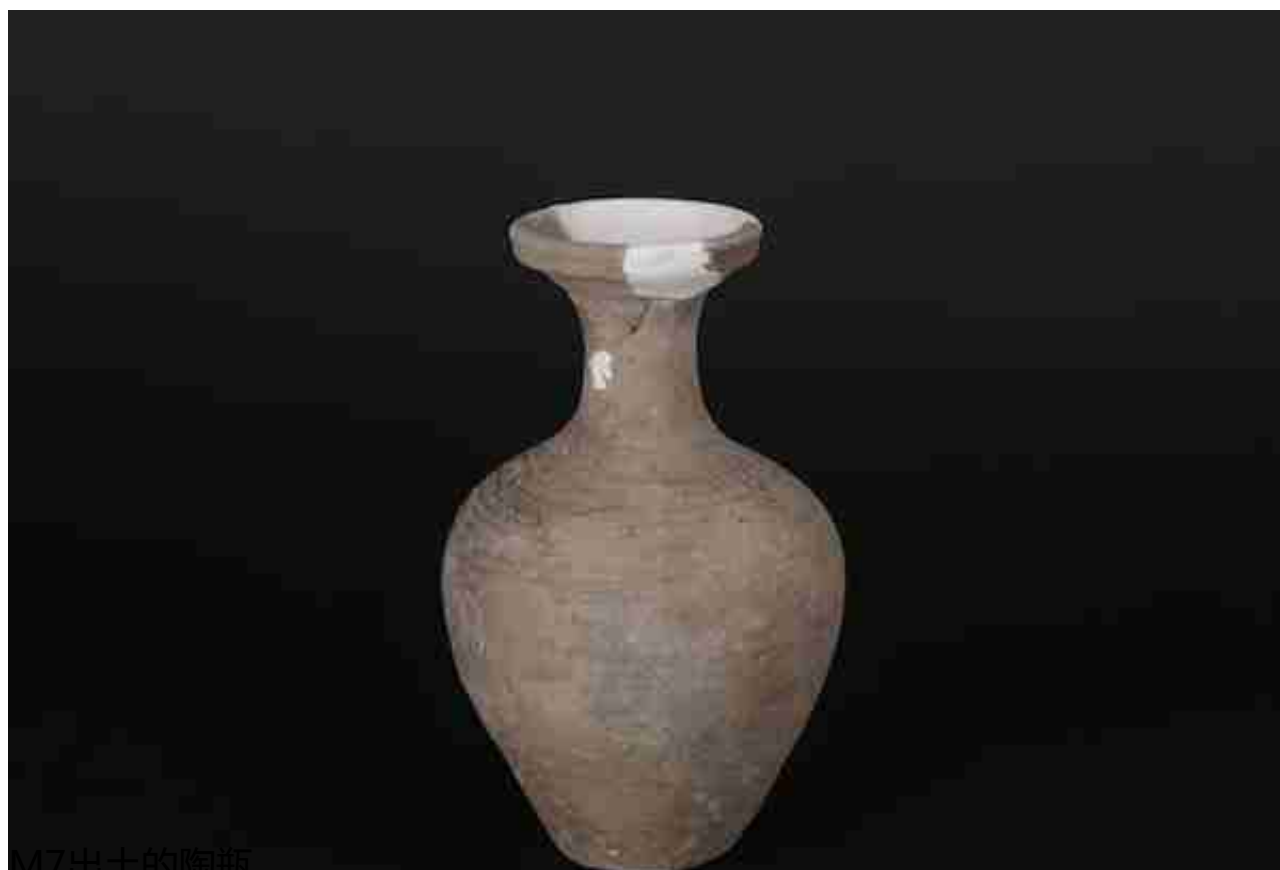


隋王韶家族墓园分布图

7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土洞墓，坐北朝南。编号M1的王韶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系地面有封土的7天井双室土洞墓，全长60米，深13.6米。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67件（组），散乱分布在墓室和壁龛内，器形可辨有武士俑、镇墓兽，骑马俑、立俑及陶猪、陶鸡等。编号M3的王仕通墓与M2、M6墓葬形制一致，为斜坡墓道2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总长22.12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6米。墓道略呈口小底大状，东、西两壁底部隐约可见红色底栏。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陶罐、铜钱和墓志等随葬品4件（组），据志文知墓主为北周原州刺史、冠军侯王楷长孙王仕通，终于北周保定年间，隋开皇九年迁葬祖茔。



编号M6的王显墓共出土66件（组），主要分布在前室，以骑马俑和立俑为主。王显为王楷长子（应为王仕通之父），终于北周，与王仕通同日迁葬。编号M7的墓葬规模仅次于M1，且位于兆域正中，为斜坡墓道3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总长25.2米，墓底距现存地表深7.84米。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59件（组），有武士俑、骑马俑、立俑，陶罐、陶瓶，铜钗、铜镜、铜饰等。编号M4的王弘墓与M5形制相近，为单室土洞墓，水平总长23.68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32米，墓室呈北宽南窄的梯形。墓室内共出土陶罐、铜镜、带钩和墓志等随葬品7件（组）。王弘系王韶世孙，宇文恺外孙，11岁夭亡，开皇十五年与早夭的北周广城公段永（尔绵永）孙女段娘娘冥婚合葬祖茔，并与王韶同天下葬。



M67出土的陶瓶

隋王韶家族墓园内的7座墓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墓志4合。墓葬分布规律，形制统一，是目前所见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也是唯一有围沟兆域的隋代家族墓园。该家族墓墓主身份明确，出土物较为丰富，是北周至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了解北周至隋家族墓地的特征、成员的埋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两座唐代纪年墓，相距200米，其中一座为唐代马政康善达墓（M13）；另一座夫妇合葬墓（M67），墓主夫妇均为皇室姻亲。

唐代马政康善达墓（M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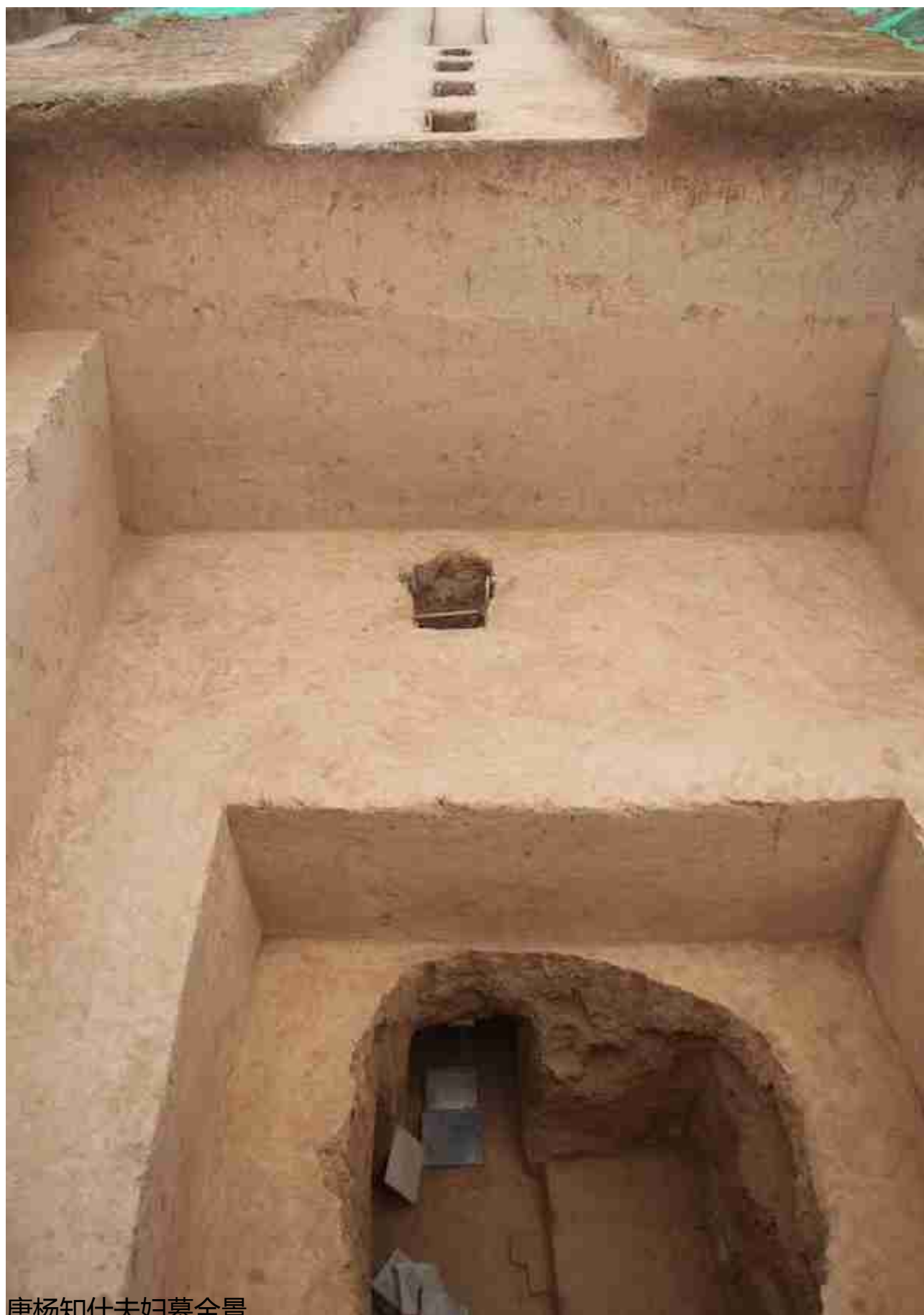
编号M13是带有围沟和封土的5天井单室砖券墓。围沟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部中间一段向南凸出，模拟墓园出口。墓葬南北水平总长42.5米，由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组成。该墓封土仅存底部，近圆形，底径19米。墓室为明圻砖券，穹隆顶已坍塌，四壁也已被破坏。底部近方形，不见铺地砖，南北4.5米、东西4.7米，未见人骨。共出土各类随葬遗物102件（组），多为放置在壁龛内的骑马俑和立俑。



这座墓葬内发现多组保存较好的墓葬壁画，保存情况较好。墓道东、西二壁绘青龙、白虎引导的出行队列。以墓道东西两壁的胡人驯马图和胡人牵驼图最为生动。胡人深目高鼻，身体后倾，左手牵缰，右手挥鞭，正在驯服一匹低头挣扎的白马。出行队伍内可见华盖、诞马及持弓箭的侍从，队伍下方有数条灵蹄猎犬，或趴卧、或昂首张望、或奔跑。考古人员根据墓志发现，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叫康善达，曾任左骁卫亲卫、咸阳监等职，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为朝廷养马的官员），据墓志记载，康善达之父亦任牧监，很可能是原州（今宁夏固原）粟特人。墓道壁画所绘的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有关。M13围沟区域还有一座墓，为5天井单室土洞墓，墓主身份不明。两座墓葬东西并列，间距5米。



唐康善达墓墓道东壁壁画胡人牵驼图



唐杨知什夫妇墓全景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